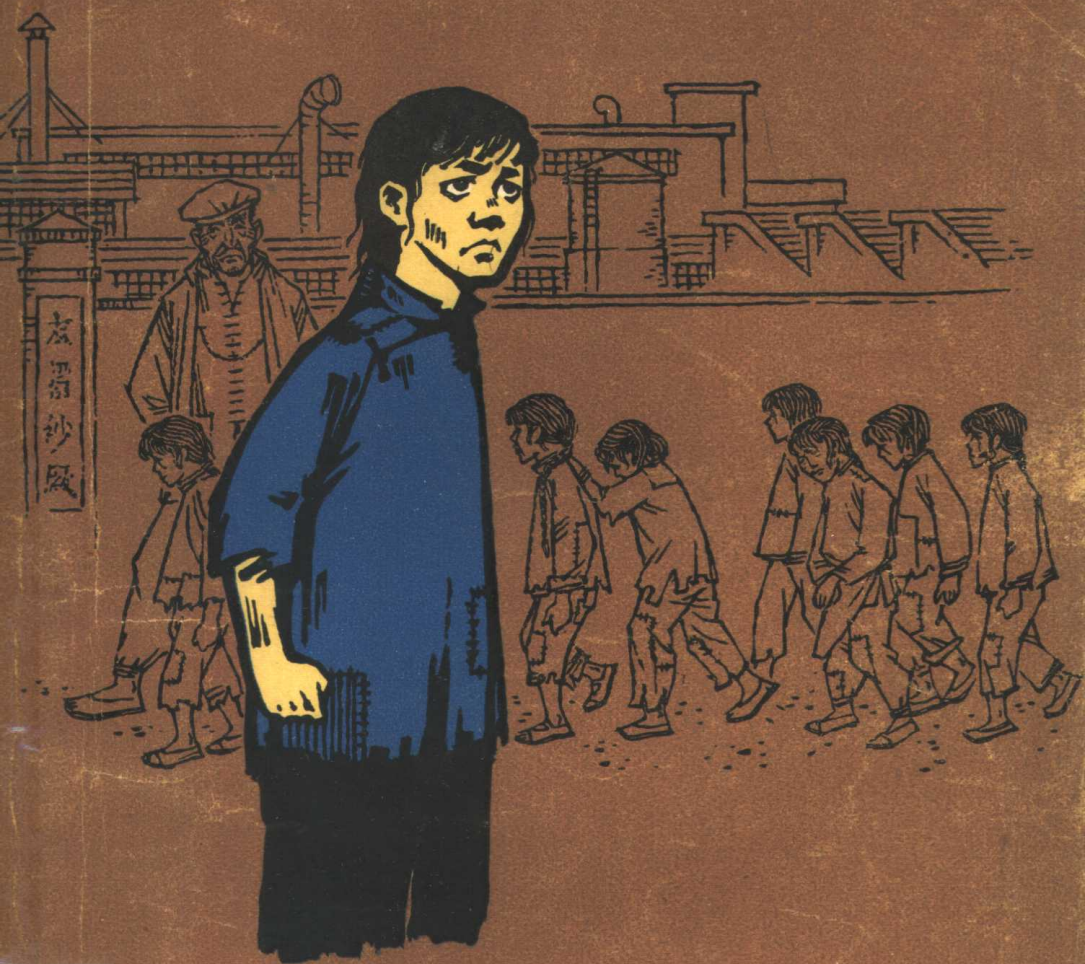




包身工的血泪仇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包身工的血泪仇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1965年

包身工的血泪仇

*

上海人民出版社編輯、出版

(上海 绍兴路 54 号)

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 001 号

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經售

*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 印张 2 1/2 字数 39,000

1965年10月第 1 版 1965年10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—30,000

統一书号：11074·354 定价：(五) 0.19 元

木刻插图·装帧：冒怀苏

目 录

包身工的血泪仇·····	錢小妹 (1)
回忆苦难的包身工生活·····	王桂英 (18)
苦海底层十五年·····	孟月珍 (37)

包身工的血泪仇

上海国棉六厂老工人 錢小妹

旧社会里人吃人，
穷人血泪比海深；
阶级压迫阶级苦，
牢记深仇与旧恨。

在旧社会里，我当过包身工，同许多遭到同样命运的阶级姐妹一样，历尽了訴說不完的苦难。黑暗的岁月已經一去不复返了，但旧社会給我留下了沉痛的創伤。这个血海深仇，我永远也不会忘記。

每当我想起自己在旧社会当包身工的种种遭遇，阶级仇恨就像烈火似地在我心头燃烧起来。

离 家

我的家乡江苏泰县郁元村，解放前是个穷庄子，一片沙土薄田，长年干旱。仅有的一条“河”，是滴水全无的干沟，吃水要跑到很远的地方去挑，还是又脏又臭的“死水”。村上的恶霸地主丁老虎，把这条干沟周围霸占了去，左近几百亩地都划

到他名下，由他再租給农民种。我家自己的地不够，也租了他这样的九亩租地。虽說是九亩，实际上三亩也抵不上一亩用，好年景每亩也不过收上七、八十斤杂粮。打的粮食常不够繳租，不得不再向丁老虎借粮。可是借一斗要还一斗六，第二年还不起，利又轉变成了本。就这样，利上滚利，債上盘債，不几年工夫，連祖上传下的三亩半地，也都归了丁老虎，除此之外，还欠下他十石粮的租子。有地的日子活不下去，丢了地的日子更难过了，一家人只好靠野菜、榆树叶、榆树皮养命。就連这样的苦日子，地主也不让太平过下去。

这一年，丁老虎的娘死了，他們拣中了我家那块租地做坟地。那时候，誰的租地被拣中了做坟地，那就算倒了楣：从挖坟、下葬，直到看管坟地，都要这家佃戶一手包。我們那儿地主家死了人，从挖坟的一天起，棺材一天不下葬，就得用活人代替躺在坑里，叫做“填坑”，下葬这一天，还要像孝子一样披麻戴孝。我爹白天給地主挖了一天坟，晚上为了搶着干点农活，只好叫我去填坑。这个地主婆是在二、三月里死的，小麦正抽芽，因为挖坟、下葬，人来车往，結果坟地旁边刚出头的小麦也被糟蹋得不成个样子。我家經歷这场大难，真象遭到水冲洗过一样的干干淨淨，每天連口湯都喝不上了。可是到了麦收时候，地主的租子还是一顆不許短少，狗腿子天天上门来討債逼命，全家人的心，都象掉在滾油鍋里。

就在这时候，同庄一个在上海当包身工老板的，到乡下来了。这人长得肥头大耳，还生滿一脸的紅疙瘩，象只癩蛤蟆，因为他姓周，人家叫他“周蛤蟆”。由于多少年生意經的鍛炼，

周蛤蟆已經背熟了一套騙人的鬼話。他的心像刀一樣厉害，但嘴比蜜糖還甜，能把一堆爛泥說成是黃金，把到上海紗廠做工，說得比登天堂還好。

周蛤蟆來到不久，就找上我家門來。他跟我爹媽說，曉得我家日子過不下去，看在鄉親面上，願意幫襯一把，把我帶到上海去進紗廠。他還說，到了上海一切都好，進了吳淞，花落天空。住的洋房、吃的大米、穿的花衣服，樣樣都有，做滿三年還可以拿到三石米。周蛤蟆見我爹媽猶豫不決，又緊盯着講了一句：

“我可是誠心拉扯你們一把，可不要錯過機會啊！”

這年我才十三歲，說真的，不要講大米飯沒有沾過嘴，就是吃糠咽菜也是有這頓沒那頓。當時，我別的不想，就想一件花衣服。記得三四歲時，娘用僅有的一條藍底白花頭巾，給我改做了一件花褂子，我一直穿到八、九歲，連肚子都遮不住了，還當寶貝似地舍不得丟。一天，給地主放牛，實在餓得支撐不住，一失足從一個高坡上滾下來，壓斷了丁老虎幾根麥苗，他給了我一頓毒打不算，還搶走了那件花褂子。我氣得哭了好幾天，以後再也沒有穿上花衣服。現在聽說到上海可以穿花衣服，做滿三年又能拿三石米，就信以為真，纏住爹媽要他們讓我去。當時一家窮得連菜湯都喝不上，做爹媽的也想給孩子找條活路，能混上一口飯吃，總比在家餓死好。結果，被包身工老板連騙帶逼，我爹就在包身契約上畫了押。

一九三九年端午節這天，我一生都忘不了的一天，周蛤蟆把我和同莊其他五個小姑娘帶走了。可憐我媽，還沒有把我

送到村口，就哭昏过去，我刚要哭叫着往回跑，还没有喊出声，凶狠的包身工老板就抓住我头发，把我拉上了船。

到了上海，在十六铺下的船。老板坐上黄包车，我们几个小姑娘跟在车子后面跑，一直跑到了曹家渡。当天，周蛤蟆给我拿来一件大红花衣服，一双垫得很高的特制的鞋。花衣服穿在身上虽然不大合身，两条小辫用红绳一扎，自己也觉得怪神气的，真恨不得马上能长出个翅膀，飞到妈身边给她看看。我真的穿上花衣服啦。这一天，我还真的吃上了大米饭，虽然因为包身工老板的限制，还没有吃饱。可是这一夜，我翻来覆去睡不着，老是想在花衣服、大米饭……。等到我刚迷迷糊糊睡去，却被一阵疼痛惊醒。一看，原来周蛤蟆拎着我的耳朵，叫我赶快起来穿上花衣服，去排队等候考厂。

我考进了日本人开的“喜和纱厂”（就是现在的国棉七厂）。这一天考厂回来，我的辫子被剪掉了，花衣服也被剥下，仍旧穿上乡下穿来的那件破衣裤。后来才知道，那件花衣服是专给包身工考厂用的。当时，我还天真地去问周蛤蟆：“你不是讲，到了上海给我们做花衣服穿？给我们……”还没有等我把话讲完，周蛤蟆就给我几巴掌，打得我天旋地转，他的脸完全变了。从此以后，我和其他三十几个被称作“包饭小姑娘”的一样，落进了这个万恶的包身工老板的魔掌。

苦 海

进了喜和纱厂，我在细纱车间学做挡车“接头”。那时候，站起来没有车子高，接头时要踮起脚才能够到。人小手生，干

起活来笨手笨脚，一看见紗头断得多了心就更慌。第一次，我拔筒管不得法，撕掉了手上一大块皮，痛得直哭。拿摩温看见了，一句话不讲，上来抓住我的头发就往墙上撞。从此，拿摩温只要在旁边一站，我的手脚就会发抖。越是抖，越接不好头，也就越要倒楣。拿摩温看见誰断头一多，接不好头，抓起一把筒管就往头上掷过来。有一次，拿摩温向我掷筒管，可是沒有掷准，竟恼羞成怒，拿起一根絞花衣的竹針走来，往我手上連刺了好几下，血順着我的手背流到了地板上。她还不罢休，又拿紗綫把我十个手指头統統繞起来，用一尺多长的戒尺专打手心和手指骨，打了再罰我跪筒管。

日本紗厂的车間里，除了压迫工人的拿摩温、狗腿子以外，还有日本領班和东洋婆子在監視工人。他們只要看到誰不順眼，动手就打，抬腿就踢。管我們车間那个满脸横肉的日本領班，待我們更是狠毒得要命，整天棍子不离手，来到车間，稍不称心，掄起棍子就打，真是個活閻王，人們背后都叫他“矮閻王”。矮閻王一进车間，拿摩温打罵工人也格外卖力，把我們这些包身工就更不当人看待。

那时候，车間里到处是飞花乱窜，整天象下雪似的，我們嘴里、鼻子里都是花衣，脸上被花衣粘得象蛆爬一样地难受，一天十四、五个小时的工做下来，被汗水粘在身上的花衣，可以一片片往下揭。车間里的悶热更是难当，走进车間就悶得喘不过气来，温度經常在华氏一百多度，就象一只大蒸籠。可是就是热死人，也不准出去透口气。有一天，我在车間里实在支撑不住了，昏倒在地上。几个工人赶紧把我抬到通风的地方，

一口气还没有缓过来，拿摩温跟在矮閻王后面赶来了。他們一面轰赶抢救我的工人，一面骂我装死，上来就是几脚，踢得我血流了一地，直到现在腿上还留下两块大伤疤。

资本家只顾榨取工人的血汗，哪管工人死活。工人进了车间，就象进了老虎口，做生活得把性命拎在手里，经常有工人因为出了事，被抬出车间去。我进厂没有多少日子，就亲眼看见一个加油工被卷上了皮带盘，另一个工人发现后立即跑去，打算关上马达，可是日本领班矮閻王正好在旁边，使劲地把他一推，还说：“死掉个把人算什么，关车造成损失，谁赔得起？”这个加油工从皮带上摔下来时，已经血肉模糊，惨不忍睹。那时候，死掉几个工人，根本没啥稀奇。

我们这样拼死拼活地在厂里干上十几个小时，可是连吃饭、上马桶都不许可。那时，工人们吃饭只能用冷水泡一泡，偷着吃下肚子。而我们包身工，吃起来连泡也不用泡了，因为带的都是一点苞米菜粥，只要能抢到嘴里就行。每天吃这些东西，还要象偷来吃似的，抢着吃几口，赶快跑到大弄堂看看，没有人来，赶紧回来再抢几口。日本领班和拿摩温一来，就得赶紧把饭盒子藏好，手脚慢一点，他们过来一脚踢光，这样，挨饿不算，还要挨一顿打。

那时候，有些厂是规定凭牌子上马桶，而我们厂连牌子也没有，干脆不让去。有时日本领班和拿摩温明明知道你要上马桶了，有心在你身边一站，让你裤子尿潮了都不能动。有一次，日本领班矮閻王看见我到马桶间去了，就拎着棍子跟来，在马桶间门口一站。我发现后，吓得马桶还没有上就往回跑。

已經来不及了，他上来一把抓住我的头发，象老鹰抓小鸡一样把我抓起，又按倒在地上，拿起棍子劈头劈脸地乱打。棍子打断了，就用皮鞋踢，头发也被一把一把地扯下来。他一边打还一边罵：“好啊！臭东西，刚来就学会偷懶，跑到厕所来揩油！”最后，他硬叫我連續做了三十几个小时，才放我回去。回到“家”，又遭到老板一頓毒打。我躺了两天两夜动弹不得，連一滴水都沒有喝。

每天十四、五个小时做下来，罪并没有受完，还要在几尺长、只能容一个人通过的木栅栏里，挤上一、两个小时，好久向前挪一步，等着由几个抄身婆从头到脚、渾身上下摸个够。有时，甚至連衣服、鞋子、袜子都得脫光給她們看；还要张开嘴巴、翘起舌头，让她們检查。旧社会里这种罪恶的抄身制度，是对工人的人身侮辱。

抄身婆最恨我們包身工了，因为包身工差不多都生疮、烂脚，脓血把衣服都粘在身上，再加上沒有澡洗，沒有衣服換，个个身上都有一股难聞的腥臭味。我們还没有走到抄身婆身边，她們已經捂紧了鼻子。有时她們嫌我們身上脏，不肯用手来抄，叫我們自己把衣服解开来給她们看，这等于揭我們一层皮。有时衣服还没有完全解开，血已經把衣服染得星星点点。有一次，我的脚烂得不能走，在车间里撿了团油花衣包了一下，那知道在厂门口被抄身婆看见了，她瞪着两眼硬說我偷了花衣，上来一撕，我烂脚上的血滴了一地，还被日本大班叫人拉在一边，打得鼻青眼肿。幸好这是放工时刻，激起了一些老工人的气忿。工人们一齐涌上来評理，吓得日本大班赶快把

我放了，但还是罰了我一星期的工錢。

罰我的工錢，等于挖包身工老板的肉。老板情愿厂里把我們打个半死，或是罰我們連續做上几天几夜，也不愿意罰一分錢工錢。这一天，当然又是我大祸临头。回到“家”里，只见周蛤蟆冷冷地对我讲：“你不是烂脚嗎？来，我就来給你治！”說完，他拿起一根燒得通紅的火筷子，咬牙切齿地往我脚上燙。嘶的一声，青烟直冒，我还没有喊出声来，就昏过去了。

折 磨

厂里的資本家也好，包身工老板也好，他們这样穷凶极恶地压榨我們包身工，都是为了要喝我們的血。

我們包身工人小，在厂里干着跟成年工人一样的活，还可以无限制地延长工作時間，可以任性地打罵、欺侮，不愁我們反抗。成年工人的工錢少得可怜，不够养家活口，而我們包身工的工錢还可以压得更低更低。正因为这样，資本家才串通包身工老板，到乡下去千方百計拐騙沒有活路的小姑娘，来替他們做牛做马。而包身工老板呢，他們一面用鞭子赶打我們去替他卖命，一面尽量降低我們的生活条件，逼我們吃得、住得比牛马还不如，从这当中榨取血汗，因此，我們工錢再低，他們照样能从我們身上賺錢。而且蓄养的包身工愈多，老板的身价、地位也愈高。

几年来，我們眼看着包身工老板一个个发起来。周蛤蟆一年四季的衣服有几箱子，进出都乘包车，在我被騙来上海做包身工的第二年，他回乡一次买了四十亩田。包身工老板如

此，資本家在包身工身上敲骨吸髓所榨取的利潤，更可想而知了。

說起包身工的生活，真是比牛馬還不如啊！

我們住在包身工老板家里，洗臉連破布頭都沒有，洗臉時冷水一沖，用衣服一抹就行了；在垃圾桶里拾來的破木梳，三十幾個人輪流用，上工來不及，用手指頭在頭上抓抓就進廠了。一間十多個平方米的房間里，要裝進三十幾個包身工，睡覺不是躺下去，而是塞进去的。冬天沒有被子，大家擠着取暖，還容易熬過去；天氣一熱那就苦啦！跳蚤、蚊子、臭蟲能把人吃掉，從五、六月開始就不要想睡好覺。到了大熱天，幾十個人擠在一間小房間里，熱氣加汗氣，就象進了蒸籠，但是天氣再熱，老板也不讓我們到弄堂里去透口氣，熱死也要待在這個蒸籠里。

在包身工老板家里吃飯比睡覺更難。我們每天吃的苞米菜粥、臭咸菜，菜皮常是從小菜場、垃圾桶拾來的，燒出來的稀粥照得見影子，如果不當心把飯碗掉進粥桶，粥湯能濺上天花板。就是這樣稀的粥，擠在後頭的人，還不一定能輪到一碗。逢到做夜班和廠休日，只吃早晚兩頓。因為據老板講，做夜班的日子，白天睡覺，多吃了是糟蹋糧食；廠休日不用出力，當然也不用多吃了。其實，到了廠休日，老板給安排的生活更多更重。

稍有點空閑，周蛤蟆就分派我們去拾菜皮。我們都把這當作“好差使”，爭着要去，因為拾菜皮時常能拾到一點蘿蔔之類的東西充充飢。有一次，我們幾個包身工實在餓得難受，在垃圾桶邊和狗爭奪起來。結果，我的腿被狗咬了一口，爛了幾

个月沒有收口。我們隔壁一个包身工老板更加心黑，給包身工烧飯的事都由老板娘亲自动手，天不亮老板就把包身工一个个赶打起来，可是老板娘却不起来烧飯，等她起来，粥还没有烧好，上工時間已到，包身工常常只好餓着肚子进厂。

我們穿的衣服，都是从旧貨攤上买来的，沒有上身就先要补。一件衣服穿上身，就不知那天才能脫下来換洗，因此每个包身工头上、身上，都是虱子成堆，伸手就能撈到一把。我們从沒有穿过象样的鞋，从垃圾桶里拾来一双破鞋，要用绳子扎在脚上才能走路，还要由日夜班小姐妹調着穿。拾不到破鞋，就是天寒地冻，寒风刺骨，也都是赤着脚进厂。有一次天下雨，虱子咬得我实在吃不消了，身上抓的沒有一处好皮，到处是疮，衣服破得都补不在一起了，我就向周蛤蟆提出，給我一件衣服，只要能补着穿就行。誰知，这一下子把他惹火了，认为是触犯了他的家规，马上喊了两个人把我捆起来就打，周蛤蟆一面打，一面对其他几个包身工吼叫：“今后誰敢要这討那，就跟她一样！”

我們在工厂里干了十几个小时下来，已經筋疲力尽了，但是不管白天、黑夜，只要回到“家”，就有做不完的“家务事”：拾菜皮、倒马桶、洗衣服、抱孩子……甚至連老板一家人的脚，都要我們洗。周蛤蟆有脚癬，每天都要我們給他捏脚。他的脚什么时候痒了，什么时候就把我們打起来給他捏脚抓痒。捏輕了要打，捏重了他上来就一脚，常把我們踢得鼻血直流。捏过脚，还得給他洗。給老板洗脚，比捏脚更难，水冷一点不行，燙一点也不行。有一次我給周蛤蟆洗脚，也不知是不是水燙

了一点，他拿起一盆洗脚水就往我头上浇来，我全身被浇得透湿。到了热天就更苦了，十几个小时劳动下来已经头昏脑胀，回来还要忍着蚊子叮咬，给老板捶背、打扇、赶蚊子。有次，我给周蛤蟆打扇，因为实在太疲劳，煽着煽着打起盹来。老板看见了，一把抓起我的头发，狠命地往墙上撞，撞得我的血流得满脸都是，老板还说：“看着！我就会治你这个瞌睡病。”他恶毒地找来几只破碗，叫我跪在碗上，头上再顶一只脚盆，手还要不停地给他煽。周蛤蟆这才重新躺下，眯着眼狞笑着说：“你就跪在这里咽吧！”更加残暴的是，老板不管把我们折磨成什么样子，都不准叫，不准哭，逼着我们默默地忍受种种苦刑。

血 泪

包身工是不能生病的，生了病也不准休息，照旧被老板用棍棒赶打着去上工，如果病得实在厉害，躺下来了，那么躺一天，将来包工期满，要罚做三天补偿。有个比我早来的小姑娘，已经苦做了四年多，就因为生过病，老板说她还没有做满三年。实际上生病躺下来，又要挨打，又要挨饿，罪更难受，所以我们生了病，都不敢吱声，硬挺着照样干活，不知多少小姑娘就这样活活地拖死了。

这样的事情，很多很多。和我同来上海的一个“堂姑娘”，是我们东庄上的。她是爹妈从育婴堂抱来的，从小没有吃过奶，身体本来虚弱，做包身工后，经不起折磨，老在生病。她每天带着病去上工，常晕倒了爬起来，强喘着气再干。因为干不动，遭到的毒打也最多，后来被折磨得象根枯草，已经完全被

榨干了。最后，日本領班不許她进厂，包身工老板看她已没有什么油水，也把她一脚踢出门去。后来听说她是倒在阴沟里死去的。

和我同来的另一个小姑娘，叫丁紅英，一連发了好多天高热，烧得嘴上沒有一处好皮，还一直不敢吱声，照旧掙扎着去上工。等实在支撑不住停下来，老板还硬逼她去拾菜皮。晚上，紅英烧得不时昏迷过去，老板連杯水都不給她喝，还說“生活做不动，就吃不动”。我放工回来，紅英一把拉住我的手，有气无力地哭着說：“小妹，快想法弄碗水給我喝吧！我渴得难过……。”好不容易等到老板睡觉，我用飯盒盛了些冷水递給她。她咕咚咕咚几口就喝光了，再也沒有讲话。第二天，天还没有亮，老板又来踢她，赶她起来和我們一齐去上工。她一动也不动，原来她早就死啦！这个受尽了苦难的姐妹，还是我們用自己睡觉的席子把她輕輕地卷起来，埋到浜北（苏州河北岸）荒地里去的。

正好这时紅英的媽赶来上海，想看看她的女儿。起先，周蛤蟆想瞞住，撒謊說：“紅英过得很好，你不必看她了，放心回去吧，再过两年就可以拿三石米回家給你养老了！”紅英的媽再三要求见見紅英，总是不得許可，才感到事情不对，坚决提出：“不管是死是活，我也要看着她一眼！”这时，这个残忍成性的吸血鬼，见抵賴不过了，忽然放下脸来，厉声說道：“好吧！你来得正好，你大概是打算来还債的，我正要找你呢！你家紅英刚来沒有几天就病倒，看病吃药花掉我一两百块钱；一年要吃我三石六斗米，共吃了我十八个月……。”紅英的媽这才知道

真相，又气又急，嚎啕大哭起来。周蛤蟆猙獰地瞪着一双布满血絲的眼睛，高声大叫：“不准哭！如果你再在我这里哭一声，就打断你的狗腿！”紅英的媽身边带着的几个盘缠錢，也被周蛤蟆夺去，然后被赶出大门。她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门，被逼得跳了苏州河。

和我同来上海做包身工的五个小姑娘，不到两年時間就死去了三个；和我同房間的三十二个小姑娘，在一年里也死掉十一个。我們有多少个階級姐妹啊，在这里很快被榨尽了血汗，又象甘蔗渣一样被拋出去。这里死得快，那里一批又一批接替的人来得还要快。那时候，在地主階級的压迫和剝削下，乡下吃不上飯的人家多，这里是火坑，就有那么多小姑娘被騙着不断地来跳火坑。

也有的包身工受不了折磨而逃跑的，但多数仍旧被抓回来。我們隔壁一个紹兴小姑娘，好容易逃离了包身工老板的家门，結果又在輪船碼頭上被抓回来，吊着打得死去活来。老板經常这样讲：“你們只要到了上海，十八个筋斗也翻不出我的手掌心！”

老板为了提防包身工逃跑，进厂、放工都亲自押解着。包身工从工房到车间，从车间到工房天天两头不见太阳，不准和外面人接触。即使亲人来了都见不到，见到了也不敢讲话。

包身工里年岁稍大一些的，往往被禽兽般的老板所糟蹋。包身工老板强奸几个包身的小姑娘，是不当一回事的。前面讲的那个紹兴小姑娘，逃跑被抓回来不久，老板就奸污了她，然后把她卖出去当妓女。我們小姐妹里，有个叫周桂英的，